

宋元官刻本概述

刘 明

所谓官刻本，历代书院官家所设各类机构刻印的书统称官刻本，如宋代有国子监、仓司、漕司、转运司、茶盐司、郡庠以及府学、州学、县学所刻的书；元代则有兴文署以及各路儒学、府学等刻印的书。瞿冕良先生在《中国古籍版刻辞典》中径谓官府刻印的本子即官刻本，实际上，有政府背景或者政府出资主持刊刻的本子也属于官刻本的范围，如宋代的公使库刻本、政府委托书坊刻印的本子等。宋元时期的雕版印刷业是古代书籍史上的繁荣昌盛阶段，包括官刻、坊刻和家刻等的雕版技术都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，其中的官刻本由于政府出资开刻的特殊背景，版刻精良，开本宏朗，尤见宋元时期的雕印特色和技术水平。

一、北宋官刻本

根据史料，五代时期自后唐长兴三年（932）至后周广顺三年（953）由国子监刊刻了《九经》，即宋人所谓的“旧监本”，可惜皆已亡佚。除此之外，国子监还校刻《五经文字》、《九经字样》和《经典释文》等书，《五代会要》云：“尚书左丞兼判国子监事田敏进印板九经书、《五经文字》、《九经字样》各二部一百三十册”，印数还是相当可观的。遍刻九经之外，后蜀宰相毋昭裔还主持刊刻了五臣注本《文选》，史料未明言是否出自国子监之手，推想当亦属于监本。五代监本的雕版刊刻，为北宋监本的刻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北宋监本《九经》即据五代监本翻刻，如日本室町氏所刊《尔雅》本末有“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臣李鹗书”题记一行，其本避南宋讳，当是南宋翻刻五代监本或北宋递翻之本。

北宋继承五代的刻书传统，以官刻为主，官刻中又以国子监刻本即监本为主。除了翻刻五代监本十二经之外，还刻印了九经唐人旧疏和他经宋人新疏。根据王国维撰《五代两宋监本考》，北宋国子监所刻的唐人旧疏本子有《周礼疏》、《仪礼疏》、《尔雅疏》、《春秋公羊传疏》和《春秋穀梁传疏》等，宋人新疏则有《周礼新义》等。此外还刻了《经典释文》、《群经音辨》、《说文解字》、《方言》、《广韵》和《集韵》等群经总义或小学类著作。宋代科举考试推动了文化教育的发展，又加上社会经济生活的繁荣稳定，因此刻书业不局限于儒家经典，而是遍及史书、子书、医书、算书、类书和以《文选》、《文苑英华》为代表的诗文总集等。根据《五代两宋监本考》，北宋国子监刻的史部书有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和《唐律疏义》等，子部书则有《法言》、《南华真经》、《黄帝内经素问》、《脉经》、《初学记》等。《宋史·选举志》云：“宋之科目，有进士，有诸科，有武举。常选之外，又有制科，有

刘明，国家图书馆馆员。

童子举……自仁宗命郡县建学，而熙宁以来，其法浸备，学校之设遍天下，而海内文治彬彬矣。”所以，除了中央国子监刻书外，地方政府所办的各级学校也有刻书业，如北宋秀州州学所刻的《文选》等。令人遗憾的是，北宋刻本传世不多，无法窥见当时刻书业的整体风貌。

北宋国子监设在汴京，汴京也是当时重要的刻书中心，版本史上便有所谓的“旧京本”之称。但大多数监本的雕造均送至杭州镂板，因为杭州有一批精良的刻工，刻书业较为发达，后晋冯道等奏请刊刻《十二经》时说：“尝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，色类绝多。”例如，《周礼疏》、《孝经正义》等即由“直讲王焕就杭州镂板”（《玉海》卷三十四“艺文”），《宋书》等七史“送杭州开板”（宋本《南齐书》牒文），《新唐书》“奉旨下杭州镂板颁行”（《天禄琳琅书目》），《资治通鉴》“奉圣旨下杭州镂板”（卷末牒文）。这些书板在杭州雕刻完工之后，再北运至汴京由国子监印行，可见北宋监本的刊刻存在着分工问题。因此说，北宋大多数监本属于浙刻本系统。

赵万里《中国版刻图录序》认为：“北宋时运往汴京的监本书版，靖康之变，全为金人掠去。”所以，现存的金刻本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宋刻本的某些风貌，清代藏书家习惯称北宋小字本，是有道理的。

二、南宋官刻本

从现存大量的南宋刻本书籍和版画中，可以看出雕版印刷业在南宋是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。雕版数量多，技艺高，印本流传范围广，不仅是空前的，甚至有些方面明清两代也很难与之相比。在雕版印刷业比较发达的地区，出现了一批技术熟练的刻工，而且在刀法刻风上逐渐形成了各自的风格。再加上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相对稳定，雕版印刷业在南宋呈现出了繁荣景象。南宋的官刻本包括国子监刻本、浙江地区官刻本、福建地区官刻本、四川地区官刻本、江西地区官刻本以及其他地区官刻本。

（一）南宋的国子监刻本

南宋浙本中的官刻本仍以国子监刻本为主。北宋灭亡之后，汴京的刻工和书板几近悉数被金人掠去，大概只有很少的刻工或书板随着宋室播迁南渡。南宋国子监重建之后，没有多少用来印书的板子，为了满足当时文化教育的需要，便向附近地方政府索取史书、子书版片入监，远在四川眉山井宪孟倡刻的南北朝七史版片也移送到监。此外，就是覆刻北宋监本的经注和单疏，例如现存的《周易正义》、《春秋公羊传疏》、《尔雅疏》等本子，尽管有些版片已经修补过。这些刻本多冠以“本监”二字，此即南宋监本。根据王国维《五代两宋监本考》，南宋国子监的刻书史部有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、《孔子家语》和《国语》等，子部书则有《荀子》、《庄子》等。

南宋国子监除了利用北宋国子监的旧版片继续刻书外，便是下令或者准许州郡刻书，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云：“先是王瞻叔为学宫请摹印诸经义疏及《经典释文》，许郡学以瞻学或系省钱，各市一本置之学。”又王应麟《玉海》云：“绍兴九年（1139）九月七日诏下州郡索国子监元颁善本校对镂板。”《建康志》所载的《九经正文》便有蜀本、建本、婺本等本子。所以，王国维认为：“南渡初，监中不自刻书，悉令临安府及他州郡刻之”，“遍刊诸经，不独国学，即州郡亦然。”因此说，南宋国子监刻本的书板由于来自多个地区，其版刻风貌也应较多样，而且地方州郡政府的刻书机构承担起国子监刻书的功能，地方官刻的本子往往进入国子监印行。

除了国子监刻书之外，浙江、福建、四川、江西等地区的政府机构也刻了很多官刻本。

（二）浙江地区的官刻本

杭州是南宋政府的行在，又是经济文化中心，所以便成了当时的刻书中心，带动了周边地区刻书业的发展。不仅表现在有一批熟练的刻工，还逐渐形成了独具风格的浙刻。现存的临安府官刻的本子有《汉官仪》和《文粹》，还有出资者无明文可稽而确系南宋初杭州刻工刊刻的，如《礼记注》、《龙龕手鑑》、《广韵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水经注》、《白氏文集》、《乐府诗集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新序》、《管子》、《经典释文》、《武经龟鉴》、《说文解字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扬子法言》、《说文解字系传》、《增修互注礼部韵略》等，为数极多，其中多数也应是监本或其他官刻本。

杭州地区所集中的当时优秀的刻工，除了参与当地的官府刻书外，还支援了浙江其他地区的官府刻书。例如，明州州学刻六家注《文选》便使用了杭州的刊工，完工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又南下到了台州。此外，温州、婺州、严州、衢州和镇江、平府等地也多有杭州刻工的足迹。所刻的书如绍兴两浙东路茶盐司官刻的八行本诸经注疏，是首次经注疏合刻，现存的有《周易注疏》、《尚书正义》、《周礼疏》和《礼记正义》几种。还有庆元府官刻《宝庆四明志》，婺州州学官刻《古三坟书》，严州官刻《通鉴纪事本末》等。在今台州官刻的《荀子》和温州官刻《大唐六典》后来又被征入杭州的国子监，作为监本印行。

浙江官刻本雕版精良，刀法娴熟，刻书的字体可以说是清一色的欧体。版式绝大多数是白口，左右双边，

单黑鱼尾。版心镌有刻工姓名和字数，多用白麻纸或黄麻纸印行。

（三）福建地区的官刻本

福建地区的刻书业，福州发轫最早，如北宋元丰三年（1080）迄政和二年（1112）福州东禅寺雕印的《崇宁万寿大藏》，是为福建大规模刊书之始。这对于福建成为宋代重要的刻

书中心起了关键性作用,表现在它培养了一批刻工,促进了当地雕版印刷经验的积累和总结。降至南宋时期,福建的刻书业主要集中在建阳,除了继承北宋以来的刻印基础外,它还有着有利的物产条件。赵万里《中国版刻图录序》认为:“福建建阳,地处闽北武夷群山中,盛产竹木,造纸工业非常发达。”另外它在地理上靠近浙江,有利于学习浙江先进的刻书经验和接纳来自浙江的刻工,还可以便利地购买浙江盛产的纸张,这些也是建阳作为刻书重地的因素。

福建地区的刻书业主要是坊刻,如麻沙、崇化两坊书肆,便刻印了大量的经史百家和唐宋名家诗文集,还有一些适应科举考试需要的大型类书和市民阶层日常参考的医书、百科全书等。但福建地区也有少数的官刻,主要呈现为以下五个特点:

1、政府机构或州学、县学的刻书往往以浙刻本为底本而进行覆刻,如绍兴十二年(1142)宁化县学刊刻的《群经音辨》,即覆刻绍兴九年(1139)临安府刻本。

2、政府机构的刻书往往使用浙江尤其是临安府的官刻本刻工,如嘉定六年(1213)汀州军刻古《算经》便使用了临安府的刻工,其中有的还刻过明州州学本《文选》。

3、政府机构自己出资刊刻,如建阳的福建安抚司刻《陶靖节先生诗注》,福建转运司刻《张子语录》和《龟山语录》,建宁府官刻《育德堂奏议》、《周易本义》,汀州军官刻《九章算术》等,泉州州学官刻《禹贡论》等。

4、政府机构委托私家或书坊刻书,如《新校正老泉先生文集》即桂阳军军学教授委托建阳书铺刊刻的。

5、一些坊刻本往往标榜为官刻以开销路,如《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尚书》加上“监本”二字即表明源自国子监刻本,有博取读者的信任以销书射利的目的。

福建官刻本字体多作颜体,棱角峭厉,或白口或细黑口,或左右双边或四周双边,或单黑鱼尾或双黑鱼尾,刻工姓名或有或无,无书耳,在建阳坊刻和浙本官刻之间,用纸多是麻沙纸。

(四) 四川地区的官刻本

四川成都自唐五代以来便已经成为西部的雕版印刷中心,如发现的成都府卞家刻本《陀罗尼经咒》等印刷品,至北宋开宝四年(971)政府派专人到成都开雕我国最早的一部印本大藏经即《开宝藏》,便说明北宋初期成都的雕版印刷业仍然是很发达的。《开宝藏》这一规模空前巨大的刻印工作,使得当地的雕版印刷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,同时培养了一批刻工,蜀本由此而得名。到了公元十二世纪左右,出版中心逐渐由成都移向了眉山,版本学上所说的蜀本实际上多数是眉山刻本。

上面已经提到成都地区的刻工还是有一大批的，所以庆元年间成都官刻的大型类书《太平御览》便使用了一百四十名以上的刊工。成都、眉山雕版主要在官府，以监本为底本，把中央政府颁行的标准本很快翻印出来，例如官刻的大字本《礼记》、《春秋经传集解》、《周礼》和《孟子》等。此外，南宋初四川漕司即转运司井宪孟在眉山刻的七史，《郡斋读书志》云：“绍兴十四年井宪孟为四川漕，始檄诸州学官求当日所颁本，时四川五十余州皆不被兵，书颇有在者，然往往亡缺不全，收合补缀，独少《后汉书》十许卷，最后得宇文季蒙家本，偶有少者，于是七史遂全，因命眉山刊行。”近代版本学家张元济发现绍兴府官刻《春秋左传正义》的刻工姓名和眉山七史有很多相同，遂认为眉山七史书版先已入浙。其实，赵万里早已经指出，井宪孟所刻的眉山七史书版南宋之初便已经移送入国子监，今天所存的眉山七史实际上已经是国子监的重刻本，已经属于浙本而非蜀本了。南宋后期，四川成为蒙古和南宋政府军事斗争激烈争夺之地，书坊刻板损毁殆尽，故今传蜀本颇少。

蜀刻本开板弘朗，字体遒劲，纸张洁白，多用白麻纸刷印，校勘精审，可和浙本相媲美。

（五）江西地区的官刻本

江西也是宋代刻书业比较发达的地区，因其地近浙江、福建，不但在刻风上与浙本有相近之处，而且使用了很多浙江、福建两地的刻工。隆兴（今南昌）、抚州和赣州是南宋初期三个发展较早的雕印地点，其中赣州发轫最早，因为赣州是江西南部文化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。例如，北宋嘉祐八年（1063）虔州赣县刻印的佛经的发现，说明北宋中期赣州之地的雕版印刷业已经进入了成熟阶段。南宋初，赣州州学又刻了《文选》，是存世最早的官刻六臣注本《文选》，还刻了《楚辞集注》等。赣州刻本刀法朴拙，版式疏朗。

淳熙初抚州公使库刊刻的六经三传，是江西较早的大型雕印工作，除了使用了来自周边地区的刻工之外，还训练了一批当地的刻工，奠定了江西刻书业的基础，因为江西刻本的很多刻工都是来自抚州的。另外，由于隆兴是江南西路治所所在，自淳熙中期以来也设局雕印，如淳熙九年（1182）江西漕台刻的《吕氏家塾读诗记》、转运司官刻《本草衍义》等。南宋中期以后，江西的刻书中心逐渐转向了吉州，官刻本如《清波杂志》、《放翁先生剑南诗稿》等。其他地区的官刻本有上饶信州官刻《书集传》，星子的南康军官刻《卫生家宝产科备要》、高安的筠州官刻《宝晋山林集拾遗》等。

江西刻本的典型风格是版式宽敞、字体自然。

（六）江苏、安徽、湖北、湖南和广东等地区的官刻本

江苏的建康（今南京）是该地区一个重要的刻书地点，在它的带动和影响下，先后出现了镇江、苏州、昆山、松江、高邮等地的刻书业。字体刻风深受两浙的影响，刻工也较多的

使用了来自浙江地区的刻工。所刻的官刻本，如南京的江南东路转运司刻《后汉书》、建康府刻《花间集》、建康府学刻《杜工部集》、镇江府学刻《新定三礼图集注》、苏州的平江府刻《营造法式》、昆山县官刻《昆山杂咏》、松江的华亭县学刻《陆士龙文集》、高邮军学所刻的《淮海集》等。

安徽地区的刻书业在南宋时期也显得很重要，如安徽南部的当涂和池州在乾道、淳熙年间的刻书业较为发达，特别是池州，其刻工主要来自当地，而且还曾支援过江西、广州等地的刻书业，说明南宋中期池州的雕版印刷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。所刻的官刻本，如淳熙三年（1176）广德桐川郡斋覆雕蜀本《史记集解索隐》、池州郡斋刻《文选》、新安郡斋刻《皇朝文鉴》等。其刻风是开版较紧，字体端秀。此外，绍兴间淮南转运司所刻的无为军教授潘旦参与校对的《史记集解》、淳熙三年舒州公使库刻的《大易粹言》和龙舒郡斋刻的《金石录》。刻风虽基本属于浙刻风格，但较浙本为秀劲。

湖北、湖南处于川浙之间的长江中游，与川、浙的交通极为便利，所以雕版印刷业也便迅速的发展起来，比较重要的刻书地有黄州、鄂州、江陵、长沙、零陵等。所刻的官刻本如绍兴十七年（1147）权知军州事沈虞卿刊印的《小畜集》、绍兴十八年（1148）荆湖北路安抚使司所刻的《建康实录》、宝祐三年（1255）江陵府所刻的《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》、零陵郡庠所刻的《柳柳州外集》等，刻风有的类似浙刻，有的则近蜀刻。

广州地区的雕版印刷业在南宋中期之后才得到发展，如宝庆元年（1225）广东漕司所刻的《新刊校定九家集注杜诗》，刻工主要为本地的刻工，但也使用了来自福建和安徽地区的刻工。

三、辽、金和蒙古官刻本

（一）辽代的官刻本

辽代刻书流传下来的不多，根据沈括《梦溪笔谈》的记载，辽代政府书禁苛严，这可能是辽代刻书传世甚少的原因。辽的刻书中心应该是在南京（今北京），刻书技术也应该是从北宋传过去的。今天所见到的辽刻本如《蒙求》和发现于应县木塔中的《契丹藏》等。刻风近似南宋浙刻而较朴拙，可能反映的是北宋浙本版刻的特点。

（二）金代的官刻本

北宋亡后，金代的平阳（今临汾）成了北方刻书业的中心，赵万里《中国版刻图录序》认为：“其地盛产纸张，质地坚韧。”叶德辉在《书林清话》中则认为这是由于“金源分割中原不久，乘以干戈，惟平水不当要衢，故书坊时萃于此”。金政府设有管理书籍出版的机构，应该也会有政府的刻书机构，但还未见有确切证实为官刻本的金刻本。今存的金刻本如《南

丰曾子固先生集》、《刘知远诸宫调》、《萧闲老人明秀集注》等，但基本上是坊刻本。金刻本的特点是行格颇密，刻字紧凑，刀法朴拙厚重如颜体或挺拔如柳体。

（二）蒙古的官刻本

蒙古时期，平水仍然是北方的刻书中心，太宗八年（1236）又设立了经籍所刻书，但可惜的是没有本子流传下来。另外设在大都的兴文署也刻书，但亦未见刻本传世。这一时期所刻的《尚书注疏》和《毛诗注疏》不知道是否属于官刻。蒙古刻本的特点是字体秀劲挺拔，延续金刻的风格。《歌诗编》没有鱼尾，在宋元本中是特例。

四、元代官刻本

元代的刻书中心，南方四川地区的眉山因为宋末兵燹战乱已经不复存在，而杭州和建阳的刻书中心地位不仅得到了继续保持，而且刻书业还有所发展。根据黄永年《古籍版本学》的意见，这两个中心的刻书在版本学上可以分别称为元浙本和元建本。因为浙江周边的江西等地的刻书风格与浙本相近，故又有浙本系统的刻本之称。而在北方，金代的平水仍是这一时期的刻书中心。元初，宋德方在平水倡刻道藏，培养了一大批刻工，使得雕版技术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（《中国版刻图录序》）。《元史·太宗纪》云太宗八年（1236）六月“耶律楚材请立编修所于燕京，经籍所于平阳，編集经史”。编修所、经籍所都是当时的官方机构，而在平水设立经籍所，反映了平水地区刻书业在北方的地位。元初，在大都又设立了兴文署，王磐《兴文署新刊资治通鉴序》云：“朝廷悯庠序之荒芜，叹人材之衰少，乃于经史创立兴文署，置署令、丞并校理四员，咸给禄廩，召集良工，剡刻诸经子史版本，颁布天下。”所以，在北方不仅平水的经籍所是官刻的中心，而且大都的兴文署也成为了又一官刻中心，但两处官方机构所刻的书未见流传，其版刻风格也就无从知晓了。

（一）元浙本和浙刻系统的官刻本

南宋灭亡之后，其国子监的书版大部分保存在了西湖书院（仍即国子监旧地），黄溍《西湖书院义田记》云：“西湖书院，实宋之太学，規制尤甚，旧所刻经史群书，有专官以掌之，号书库官，宋亡学废，而板库具在。”西湖书院除了保存南宋国子监的刻板之外，自己也开刻了一些书，如泰定元年（1324）西湖书院刻本《文献通考》等。这些版片可能在元代作为很多刻本的底本而进行重刻或者覆刻，也有可能利用这些版片重新刷印书籍。入明之后又转存到南京国子监，并依据它们刻印了不少书，所谓的“三朝板”实际上就是利用这些烂版子经过补修之后重新刷印的。直到清中期的六丁之厄，才毁于殆尽。

元代的官刻机构包括行省、各路儒学、州县学和书院等，如元代官修的《宋史》、《辽史》和《金史》便是由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来刊刻的，这就说明元代的杭州仍是当时雕版技术水平

最高的刻书中心，远胜于平水和建阳。除此之外，江浙等处行中书省还刻了《大德重校圣济总录》和《大元一统志》等。各路儒学刻书以九路本《十史》为代表，也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各路儒学刻书活动，由大德年间江浙行省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所属的九路儒学分刻，张元济《校史随笔》“隋书元大德九路刊本”条云：“明黄佐《南雍志》：元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使以《十七史》难得善本，从太平路学官之请，遍牒九路，令本路以两《汉书》率先，诸路咸取而式之。”实际上《宋书》至《周书》七种未刻，所谓九路指宁国、徽州、饶州、集庆、太平、池州、信州、广德和铅山州。九路本《十史》现存的尚有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隋书》、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等几种。除此之外，各地官刻比较著名的还有扬州路学官刻《石田先生文集》，嘉兴路学官刻《大戴礼记》、《汲冢周书》和《诗外传》，绍兴路学官刻《吴越春秋》，在今宁波的庆元路官刻《玉海》、《困学纪闻》，抚州路学官刻《雍虞先生道园类稿》，无锡州学官刻《白虎通德论》、《风俗通义》等。

元制各地书院设有山长，是朝廷委任的命官，与州县学共同参与刻印业。书院刻书也是元代官刻的一大特色，如今江西铅山的广信书院刻《稼轩长短句》、陈仁子东山书院刻《梦溪笔谈》等。

元浙本的版刻特点，字体受到赵体的影响，而在欧体的基础上加进赵体的成分，使结构和点画变得流动灵活，有的则更完全是赵体。江西地区的官刻本，由于受到福建地区刻风的影响，近似颜体。相台岳氏本则全是欧体，俨然宋刻风格。书口多白口，也有细黑口，用纸多用白麻纸或黄麻纸刷印。

（二）元建刻系统的官刻本

建阳地区的刻书业仍以坊刻为主，且像余志安勤有堂的刻书业，宋代就已经开始，甚至到明代还在刻书，建安余氏可以说是历经宋元明三朝不断刻书的家族。和南宋朝的情况相似，元代官方往往委托书坊刻书，如余志安刻本《四书通》有张存中跋云：“泰定三年（1326）存中奉浙江儒学提举志行杨先生命，以胡先生《四书通》大有功于朱子，委令赍付建宁路建阳县书坊刊印，志安余君命工绣梓，度越三稔始克就”云云。

元建本的特点是字体作颜体，但显瘦劲圆润一些，书口作黑口，用纸麻沙纸和竹纸刷印。

（三）元平水本

元平水本的情况已在蒙古刻本中有所涉及，官刻本今未见有流传，主要还是坊刻和家刻。

赵万里《中国版刻图录序》说，从十世纪到十四世纪，包括宋、金、元三朝，除了浙江杭州、福建建阳、四川成都眉山、山西平阳四个文化区刻印了大量书籍行销四方外，其他地方政府、私人 and 书坊也都从事刻书工作。见于《郡斋读书志》、《直斋书录解題》、《遂初堂书

目》、明初《文渊阁书目》和其它文献资料来统计一下，见于著录的绝大部分是刻板印本，就可以知道宋元时期雕版印刷量的庞大了。

五、展品介绍

00393 《史记》（卷一至四、八至一百三十配南宋初建阳刻本）

北宋刻本，半叶十二行二十三字，小字双行二十七字。白口，左右双边。写刻俱佳，颇为珍贵。所配补的南宋建阳刻本，亦是孤本。钤有“杨绍和读过”、“木斋秘玩”诸印章，跌经毛氏汲古阁、汪文琛、汪士钟、海源阁递藏，流传有绪，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。

《史记》，汉司马迁撰，南朝宋裴駰集解。裴駰，字龙驹，河东闻喜人，官至南中郎参军。集解之前有徐广所撰的《史记音义》，虽有发明但颇为简略，于是裴駰乃采九经诸史、《汉书音义》以及众书之目而撰是书。南宋黄善夫合刻三家注后，是书遂流传日稀，传世甚为孤罕，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和版本价值。

此本系汲古阁旧藏，朱修伯批本《四库简明目录》云：“毛刻出自北宋本，与各本不同。”又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云：“汲古阁刻单集解，据北宋本，正文与各本多异。”所据之北宋本当即此本。除此本之外，根据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尚有傅增湘藏北宋刊十行本、海虞瞿氏藏北宋刊十四行小字本和北宋刊十四行巾箱本。又张金吾《爱日精庐读书志》著录北宋残本《史记集解》十四卷，遇禎字不缺笔，定为仁宗之前刊本。惜上述诸本多已不存，此本的价值就更显珍贵了。

01079 《范文正公集》（卷一配抄本）

北宋刻本，半叶九行十八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。卷端题“范文正公集”，而非“丹阳集”或“丹阳编”。宋讳“暑”、“树”、“警”皆缺笔，“桓”字不避，当是钦宗之前刻本。纸墨古雅，白麻纸宋印，至为可宝。钤有“杨堃”、“穀士”、“鹿城杨世泽端生珍藏”诸印章，今藏国家图书馆。

《范文正公集》，北宋范仲淹撰，《郡斋读书志》云其“为学明经术，跂慕古人事业，慨然有康济之志，作文章尤以传道为任。”范仲淹于经术谙熟贯通，又能够明达政体，因此所写诸篇文章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评为“一一皆有本之言”。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云此本“吴门范氏主奉家藏书，后归嘉定廖氏，陈立炎携之北来，为余收得。”按卷前清人题记云出自“范氏主奉家”，则此本乃范氏世代宝藏之本。诸公私书目罕见有著录此版本者，盖天壤间之珍本也。

00354 《龙龕手鑑》（卷二配清初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）

宋刻本，半叶十行，大小字不等。白口，左右双边，版心上记字数，下记刻工。白麻纸

印本，字字如新，洵为珍贵。钤有“汲古主人”、“毛氏子晋”、“毛晋私印”、“汪印士钟”、“铁琴铜剑楼”诸印章。迭经名家收藏，流传有绪。今藏国家图书馆。

《龙龕手鑑》，辽释行均撰，行均字广济，俗姓于氏。是书凡部首之字以平上去入为顺序，各部之字再用四声分列，共计录字 26430 余字，搜集了大量的《说文》、《玉篇》之外的字。每字之下详列正体、俗体、今体、古体或作诸体，而且辑引了很多佛书字体，虽然间有舛讹，但实为颇具学术价值的小学类著作。

《龙龕手鑑》乃辽代传入中原的唯一著作，《郡斋读书志》引沈括语云：“契丹书禁甚严，传入中国者法皆死。熙宁中，有人自虏中得此书，入傅钦之家。蒲传正帅浙西，取以刻板。”此本以刊工证之，当为南宋浙江刻本，藏家多误以为辽本或蒲传正本。傅增湘有藏本，行款版式与此本皆同，然并非同刻，当属于此本的覆刻本，更足见此本的珍贵。

00445 《资治通鉴》

宋绍兴二至三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本，十二行二十四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。白麻纸印本，纸墨莹润，刀法规整。钤有“天禄琳琅”、“天禄继鉴”、“乾隆御览之宝”等印，迭经文徵明、顾从德、季振宜、徐乾学等名家所珍藏，清初又为内府天禄琳琅收藏，今藏国家图书馆。

《资治通鉴》，宋司马光撰。是书编集历代君臣事迹，上起战国，下迄五代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评为：“网罗宏富，体大思精。”此本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》著录，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刻本。

00545 《大唐六典》

宋绍兴四年温州州学刻递修本，半叶十行二十字，小字双行同。白口，左右双边，有王秉恩、沈曾植跋。白麻纸印本，蝴蝶装。钤有“国子监崇文阁官书”长方朱印，当系元大都国子监藏书，今藏国家图书馆。

《大唐六典》，唐玄宗李隆基撰，李林甫等注。是书以三公、三师、三省、九寺、五监、十二卫等，列其职司官佐，叙其秩品，以拟《周礼》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评为“一代典章，釐然具备”。

此本以刊工考之，原版约居五分有三，其余的补版刻工多孝宗至宁宗六十年间杭州刊工。据此可以推知，此本刻成之后旋即取入临安国子监。元代西湖书院补版诸刊工于卷中绝不见，当是南宋末印本。

00590 《荀子》

宋刻本，半叶八行十六字，小注双行二十六字。白口，左右双边，版心有刻工姓名。版

刻精良，字大如钱，诚为佳槧。钤有“士礼居”、“汪士钟藏”、“祁阳陈澄中藏书记”诸印章，曾为黄丕烈插架之本，后又迭经名家递藏。今藏国家图书馆。

《荀子》，唐杨倞注，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以倞为杨汝士之子，生平不可考。此书见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，总三十三篇。至唐杨倞分易旧第，编为二十卷并为之注释，更名《荀子》，此即今本也。倞注甚为详洽，是研究《荀子》的重要注本。

《荀子》于北宋有国子监本，南宋有公使库本（唐本）、国子监本、钱佃本等。此本《荀子》为宁宗时重刻本。版式格局旧依监本规制，属监本系统。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云：“唐仲友刊于台州本即据熙宁监本。”此本今海内仅存，至为罕见。

00682 《周髀算经》

宋嘉定六年（1213）汀州军鲍澣之刻本，半叶九行十八字，小字双行同。白口，四周双边。初刻初印，棱角峭厉，黄麻纸刻印，乃闽刻精品。今藏上海图书馆。

《周髀算经》，汉赵君卿注，北周甄鸾注，唐李淳风等注释。是书主要阐明盖天说、四分历法等，至唐初归入国子监算学教程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评价说：“古者九数惟《九章》、《周髀》二书流传最古，讹误亦特甚，然溯委穷源，得其端绪，固术数家之鸿宝也。”此本为存世最早刻本，明末汲古阁曾据此本影写。

01016 《陶靖节先生诗注》

宋淳祐元年（1241）福建安抚司汤汉刻本，半叶七行十五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。写刻精美，版式风貌颇具建本特征。钤有“士礼居”、“汪印士钟”、“闽源真赏”、“杨绍和印”、“周暹”等印章，流传有绪。又有周春、顾自修、黄丕烈跋，堪称稀世之宝。今藏国家图书馆。

《陶靖节先生诗》，晋陶渊明撰，宋汤汉注。陶渊明尝著《五柳先生传》以自况，世号靖节先生。汤汉，字伯纪，号东涧，淳祐中充国史实录院检勘。《郡斋读书志》云陶集有数种，七卷者梁萧统编，十卷者北齐阳休之编。此本为黄丕烈陶陶室收藏的两种陶集之一，系汤汉注本的最初版本，传世孤罕，弥足珍贵。

01021 《王摩诘文集》

北宋末蜀刻本，半叶十一行二十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。钤有“项墨林鉴赏章”、“汪士钟印”、“海源阁”等印章，流传有绪，甚为珍罕。今藏国家图书馆。

《王摩诘文集》，唐王维撰。根据《郡斋读书志》，唐代宗访王维的文章于其弟王缙处，汇集十卷上之。此本为宋代蜀刻十一行本唐人集之一，其版式刀法与蜀刻《李太白集》、《骆宾王集》如出一辙。傅增湘认为盖晚印之本，书中多有补修之板。

参考文献:

1. 北京图书馆编《中国印本书籍展览目录》，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出版 1952 年。
2. 北京图书馆编《中国版刻图录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61 年版。
3. 宿白著《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99 年版。
4. 王国维《五代两宋监本考》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 年版。
5. 黄永年《古籍版本学》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2005 年版。
6. 李致忠《古书版本鉴定》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7 年版。
7.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、国家图书馆编《国家珍贵古籍特展解说词》，2008 内部资料印行。